

九州南盡復南洋：黎國昌作品中的 離散詩人交遊與詩用實踐*

李知灝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提 要

新加坡新聲詩社名譽社長黎國昌，早年遠赴法國里昂大學取得理科博士學位，返回中國後歷任廣東中山大學、上海暨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之教職，1949年因國共內戰轉至香港華僑工商學院任教。1955年獲聘為南洋大學理學院教授，晚年依親定居日本。他的詩友遍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臺灣、香港、日本……等地。在作品中充分體現他在輾轉於各國的生命歷程及其詩人交遊；在漢詩唱和中可見他的離散心境，以及同樣經歷戰亂流離的各國詩人相互唱和。這體現了漢詩在戰後傾向於「詩用」的書寫傾向，詩歌與離散自中國的各地詩人產生連結，重現古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社會文化行為。

關鍵詞：離散 新聲詩社 南洋大學 新加坡文學 漢詩

* 本論文為科技部計畫「冷戰下的『自由』漢詩壇：《亞洲詩壇》反共社群建構及其作品研究」（科技部編號：108-2410-H-194-077-MY2）之部分成果。

九州南盡復南洋：黎國昌作品中的 離散詩人交遊與詩用實踐

李知灝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新加坡，自開埠以來即為東西商旅、文人墨士往來之處，華文書寫也在晚清時期開始萌芽。從清朝派駐新加坡擔任外交使節的左秉隆（1850-1924）、黃遵憲（1848-1905），或因戊戌政變而逃難的康有為（1858-1927），都曾在此地留下詩作，此後移居當地的邱菽園（1874-1941）更成為新加坡代表文人。而民國初年的紛擾局勢，更是讓不少中國文人陸續移居此地。此時，漢詩書寫的傳統並未中斷，詩歌唱和頻仍。且這些南來文人雖定居新加坡，但對故鄉中國的懷想並未完全中斷，形成強烈的僑民意識反應在詩中。^❶

1953年南洋大學的創設，吸引相當多的港臺學者前往新加坡任教，在中文研究的知名學者如劉太希、潘重規，都曾被南洋大學延攬至當地任教。在此同時，客居香港的生物學家、詩人黎國昌也獲聘於南洋大學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期間，黎國昌與當地詩人共同倡立「新聲詩社」，後又被推為名譽社長，詩名遠播東南亞、臺灣、香港、日本等地。然於過去，其詩多僅見於當時詩刊雜誌，難以一窺全豹。幸而近年相關文獻陸續發現，得見黎國昌之詩文集《天香書屋倡酬初集》

❶ 相關論述可見林立：〈流寓與本土意識：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東方文化》第48卷第1期（2015年6月），頁83。

與《天香書屋唱酬貳集》，^②終可對其人其詩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黎國昌留下的詩文著作二集皆以詩歌唱和為題，在內容上也多是他與東亞、東南亞各地詩友相互贈答之作。這些唱和之作除可探究黎國昌的生平遭遇與詩文交遊之外，從中更可一窺當時的時代背景與知識分子的精神樣貌，以及面對不同事件情境下，個人感發與群體意識間的互涉。這種情況就如同中國古代知識份子以詩言志或諷諫，進而衍生出「詩用」的概念。正如《論語·陽貨》所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③當中的「興」、「觀」偏重於個人的感知，但「群」與「怨」則偏向於社會功能。所謂的「群」，即是透過詩歌來聯繫群體的情感。而「怨」則是如何以詩歌對上位者提出諷諫，還要運用詩歌體裁的特性達到《詩經·大序》所言「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④的境地。這都延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將詩歌運用在社會的傳統，最終形成一個社會文化中的「詩用」功能。就如同顏崑陽在〈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一文中所言：

用詩，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行為模式；而詩，就是這種行為模式的中介符號。^⑤

以詩為媒介的社會文化行為，最終形成中國知識階層精神樣貌的面向之一。文中並探討這樣的行為之所以能形成的基礎、唱和行為的成因與作品中隱藏符碼的形成，更探討「詩用」功能的幾種次類型。顏氏所提出的論述適足以運用來進一步

② 本文所用之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香港：天香書屋，1955年），為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典藏；其《天香書屋唱酬貳集》（東京：出版不詳，1980年），則為筆者從藏書家處獲得。以下所引《天香書屋倡酬初集》及《天香書屋唱酬貳集》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初集、貳集及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③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77。

④ （漢）毛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毛詩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74。

⑤ 見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臺北：允晨文化，2016年），頁268。

詮釋黎國昌與其詩友何以能形成這種特殊的社會文化行爲？其背後的時代背景爲何？他們因爲那些事件而有共同唱和的原由？在這些唱和作品內又呈現甚麼樣的「詩用」面貌？此即本文所欲探討者。

二、黎國昌的離散生涯與詩友交遊

欲探討黎國昌詩作的詩用實踐，首先對他的生平交遊應有一定的研析。過去對黎國昌僅知其名，未能更深入了解其生平事蹟與交遊。因此本文首先從詩集中的詩文內容與當時詩刊雜誌刊登的作品，搭配相關的背景研究，來考察黎國昌的生命經歷。

（一）流離生涯與詩文發表

黎國昌（1892-1983），^⑥字慎圖，別號壑泉散人、浩川、新之，廣東東莞人。早年自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結業，1921年以「廣東特待生」的身分外送法國里昂中法大學。^⑦並於1924年7月獲得理科博士頭銜。回中國後任職於廣東大學擔任生物學教授兼生物學系理科主任、教務主任等職，1926年擔任廣東大學改制爲中山大學之籌備委員，^⑧後一度擔任該校教務主任。^⑨1927年9月因故離開中山大學，

^⑥ 黎國昌之生卒年，生年部分馬崙《新馬文壇人物掃描》作1892年，見馬崙：《新馬文壇人物掃描》（吉隆坡：書輝出版社，1991年），頁178；徐丁丁〈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建——以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為中心的考察〉作1894年，見徐丁丁：〈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建——以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為中心的考察〉，《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2期（2017年12月），頁144。然黎國昌在其〈戊戌重九龍山雙林寺登高口占一律〉的註腳中提到「時年六十七」，因戊戌年為1958年，再加上過去應有虛歲的記歲習慣，故生年當以1892年為是。至於卒年則僅見徐丁丁〈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建——以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為中心的考察〉一文，暫以此定年。

^⑦ 陳三井：《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年），頁112。

^⑧ 黃福慶：《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8年），頁13。

^⑨ 在葛濤〈新發現的兩個署名周樹人的通告考證〉中發現當時中山大學教務處曾有二則署名「周樹人、黎國昌」的公告，可證明當時周樹人（魯迅）與黎國昌曾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

⑩前往揚州旅遊散心。⑪ 1929 年擔任上海暨南大學生物學教授兼系主任，奉派為第四次太平洋科學會議之中國代表前往印尼開會，回程考察印尼、新加坡等地的教育實業，⑫並於 1933 年出版《南洋實業科學教育考察記》。⑬此後轉任南京中央大學生物學教授兼教務主任。

此後在二戰末期與戰後國共內戰之際的緣故，黎國昌由南京經上海避居香港。在這時期詩作有〈程仰垓自臺州寄示梅菊四詠依韻和酬時任教滬濱〉、〈上海九重天登高〉⑭等詩，可知他當時任教上海。由其〈五二生朝〉一詩，如以虛歲計算，可知當時為 1943 年。但他在日後的詩作裡曾說「己丑由上海改教香港」，⑮可推知他在 1949 年由上海移居香港。

香港時期應是黎國昌開始蓬勃作詩的發端，他亦在此時期出版第一本詩集《天香書屋倡酬初集》。而他開始積極投入創作的的原因，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

憶余少承家學，於詩文雖稍窺門徑，及長游學北京，繼更遠適法國專研生物學，舉凡著作俱用法文，遂於詩道日益疏遠矣。壯年回國，迭長廣州南京國立大學教務，兼任課務，每於公餘之下從事編著專科教本，窮年鉛槧，

葛濤：〈新發現的兩個署名周樹人的通告考證〉，《現代中文學刊》第 4 期（2019 年 8 月），頁 53-56。

⑩ 徐丁丁：〈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建——以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為中心的考察〉，頁 144-145。

⑪ 在「揚州夢影」開端有小序敘明：「內子杏荃歸自京都，不數日余卸中大教務長職。適承江都檢察長郭純如函召游覽揚州，因思歸國服務四載以來，從未得一日抽閒。今決乘此良機，欣然相攜應召而往。流連風月，隨意所適，為詩寄興，得暢所懷。」（初集，頁 1）

⑫ 正如他在〈題星洲集影一絕〉的小序中所言：「一九二九年被派出席第四次太平洋科學會議充當中國代表前赴印尼開會，在回程中留星印視考察教育實業。」（貳集，頁 16）此事亦為《南洋商報》報導，見不著撰人：〈太平洋科學會議中國代表黎國昌君過叻〉，《南洋商報》第 6 版，1929 年 6 月 18 日。

⑬ 黎國昌：《南洋實業科學教育考察記》（廣州：廣東省教育廳，1933 年）。

⑭ 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 8。

⑮ 見〈南大同寅先後連翻祖餞或家宴廚或市樓買座或學生樓夜會備感盛情一章並期後會〉一詩。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 83。

更於韻學久荒。繼以遭逢時變，外侵內亂，相迫而來。身與蓬飄，家隨瓦毀，始復以詩歌自遣，用寫我憂。（初集，序頁3）

黎國昌祖上曾任職於清朝為官，¹⁶於詩文應自幼即習得。起初並未進一步鑽研此道，直到經歷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劇變，自己也輾轉離散至英國的殖民地香港，才重新學習作詩用以排遣心中去國離散的惆悵。他在此時對創作的熱情，正如當時受教於黎國昌、曾就讀香港知行中學的陳耀南¹⁷所回憶：

教我們生物學的黎國昌先生。據說是留法博士。眼睛大大，下巴短短，鬍鬚伸向兩邊，像頭智慧極高的老貓。這個真感受說出來，絲毫沒有減少同樣是真正的敬佩之意。聞說後來去了南洋大學教書，當年與我們這班不知所謂的中學生為伍，真是屈就了。黎老師還給我們看他寫的好幾十首律詩、絕句。如果當年這班毛頭小子有誰完全讀對了他詩中的文字，甚至懂得賡和，老人家一定樂得頤解鬍開，笑不攏嘴。¹⁸

雖然黎國昌在香港仍教授其本業生物學，但當時學生都知道他對漢詩的熱愛，在數十年後仍記憶猶新，就可見他當時的創作熱情。而此時因戰亂離開中國大陸的離散思緒，也顯露在黎國昌的詩作中。從香港時期末期寫下的〈赴南洋大學生物學系教席別港澳文友為賦四章敬乞賜和〉其一詩中就顯現他的感嘆：

香江歲月閱炎涼，席上儒珍帚自將。歸國心期同管蔡，韜時海曲愧鴻光。

¹⁶ 〈客有問天香書屋者口占一律有序〉的小序中提到其家世背景：「先祖聽之公致仕後，築室於西南塘，顏其額曰『天香園』，中有讀書樓、花畦、魚池、釣石。先父麟臺公與先伯雲臺公更添南塘小築，題曰『天香』，深處珍藏書畫，謹守世業垂八十年。」（貳集，頁33）

¹⁷ 陳耀南，廣東新會人，中文學者，曾任教於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學院、臺灣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後移民澳洲。

¹⁸ 陳耀南：《鴻爪雪泥袋鼠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頁23。

六旬生¹⁹世情何感，萬里²⁰浮舟意更長。又是攜妻行萬里，九州南盡復南洋。（初集，頁70；貳集，頁12）

1955年原本黎國昌已決定退休前往日本與兒孫團聚，不意接獲新加坡南洋大學的聘書，邀請他到新加坡講學，自此開拓另一段新的生涯。但在詩中黎國昌回想他六十年來的歲月裡，流離香港時期讓他更深刻體會世間的炎涼，對於自己教育事業愈是珍惜。他們夫妻二人想回到中國的心思就如同東漢末年因戰亂而逃離中原的管寧、蔡文姬一般，但現實上卻只能隱身在海濱香港像逋逃吳地的梁鴻、孟光夫妻般相互扶持。只是沒想到中國南端的香港還不是他們夫妻流離的最南端，還將乘船到更南端的南洋新加坡教學。詩末「九州南盡復南洋」之語即自嘲時代變局下，無法回到中國大陸的故鄉，卻又將更往南方的離散之感。

黎國昌至新加坡擔任南洋大學生物學系教授，此後在1956到1957年間兼生物學系主任、1962到1964年間兼理學院院長。²¹在學術教育工作之餘，黎國昌也參與新加坡當地的漢詩活動。將甫出版的《天香書屋倡酬初集》分贈新加坡詩人，很快獲得當地詩人的回饋，²²開啓了相互唱和的契機。除詩文唱和外，更與當地詩人共同創立新聲詩社，並於1958到1959年間擔任副社長，後更被推為名譽社長²³。而黎國昌此時的詩作中，亦曾隱隱顯露對自己身處離散情境的自嘲，如他在

¹⁹ 《天香書屋倡酬初集》作「閱」，然《天香書屋唱酬貳集》作「生」，據以校改。

²⁰ 《天香書屋倡酬初集》作「一葉」，然《天香書屋唱酬貳集》作「萬里」，據以校改。

²¹ 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吉隆坡：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1990年），頁184及189。

²² 如其〈次答李俊承詞丈謝贈倡酬初集之作並分東酬諸文友乞同正〉一詩，後面附有新加坡詩人李俊承、洪鏡湖、蔡寰青等人收到詩集後的酬謝之作。又如〈劉潤芝舒卷雲陳寶書黃宗漢詞長謝贈初集之作各次答一章〉中附上劉潤芝、舒卷雲、陳寶書、黃宗漢等人的答謝之作。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17-19及31-32。

²³ 根據「新聲詩社章程」第九章「名譽職位及贊助人」規定：「理事會可聘請德高望重之社會賢達或熱心贊助本社者擔任，下列名譽職位，（A）名譽社長。（B）名譽顧問。（C）名譽理事。（D）贊助人。」黎國昌在〈新聲詩社最近百期社課選輯序〉中言：「余以職業居星雖僅足十有二載，而於新聲詩社同寅別有深長之風義。旅星之候，固常得面承教益，即來日之後，尚蒙公等連年不棄，推選為名譽社長，最近更加冠『永久』字樣。」（貳集，頁129）本文亦

〈庚子詩人節雅集感作〉一詩中寫到：

屈平愛國拙身謀，汨水江喧滾淚流。早改美人空想像，應憐芳草尚溫柔。
有天欲問呵孤壁，無地理愁賸一杯。識理知書虞損性，人生自古等俳優。²⁴

在開端反諷屈原雖然愛國，卻拙於謀求自身的未來，不像自己早已放棄追求明君救世，只求保有自己德行的忠貞。然而詩作後半卻嘲諷自己像屈原一樣，仍有很多疑惑想向上天發問，最終只能對著牆壁發怒。無盡的愁思難以掩蓋，最終只能隨著自己死去方能入土。縱使能通達事理也無濟於事，只是造成自己心性的損傷。因為人的一生活佛像演員一般，只能照著無形的劇本演出。詩中將屈原的事蹟與自己的離散情境疊合，其實就是自嘲眼見時局演變、去國懷憂，卻又無力反抗命運的無奈。

黎國昌在 1968 年於南洋大學退休後，依親定居日本東京澀谷代官山。在日期間，曾參加斯文會、東京聖社漢詩會活動，並擔任東京春秋學院顧問。此外也在 1979 年獲臺灣中華學術院聘為詩學研究委員、²⁵ 菲律賓環球詞苑聘為名譽苑長。其後更於 1980 年出版《天香書屋唱酬貳集》。然而出版過程卻經過一番波折，陳寶書在〈黎國昌博士天香書屋唱酬貳集序〉即言：

初，博士擬於香港發刊天香書屋唱酬貳集，詎托非其人，不但未予付印，復沉沒其稿。今年春，追檢舊作，及近十年來詩詞，裒集成帙，將於東京出版，……（貳集，頁 8）

黎國昌在晚年盡力蒐集舊作，才得以讓自己與相互唱和的東南亞、港臺與日本詩

見於新聲詩社《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文字上略有不同，但大抵確認黎國昌曾為該社名譽社長。見新聲詩社：《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81 年），頁 2-3。

²⁴ 黎國昌：〈庚子詩人節雅集感作〉，《南洋商報》第 15 版，1960 年 6 月 3 日。

²⁵ 此為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頒給海內外各地漢詩耆老的榮譽頭銜，未必參與組織運作。

友的作品，不至於湮沒在時間的洪流之中。雖然出版地標示為日本東京都澀谷區代官山町の黎家寓所，但這本詩集卻是在臺灣印行，由「南京中央大學在臺受業門生」負責編校，由臺北市西昌街的精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雖然未知當時負責編校的受業門生為何人，但也可見這本詩集得以刊行問世，亦動用黎國昌與門生等多人之力進行編纂，由來不易。

綜觀黎國昌生平經歷，大致可分為：早年時期、法國里昂時期、廣東時期、江浙時期，以及戰後的香港時期、新加坡時期與日本時期等七個階段。其中，早年與法國里昂時期的詳細經歷難以追溯，自法國返回中國之後，方有較多文獻可考。在中國期間輾轉任教於廣東、上海與南京等地，戰後則離開中國，轉往英國殖民下的香港、新加坡任教。晚年則依親移居日本東京。下以簡表顯示其生平梗概：

時期	大事記
早年時期 1892~1920	生於廣東東莞。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結業。
法國里昂時期 1921~1924	赴法國就讀里昂中法大學。 指導教授為普利加 (A. Policard) 教授。
廣東時期 1924~1927	1924 年畢業返回中國。旋任教於廣東大學，擔任教授兼生物系理科主任、教務主任。 1925 年廣東大學改名中山大學，擔任籌備委員。 1926 年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 1927 年辭中山大學教職。
江浙時期 1927~1949	1927 年至揚州旅遊。 1929 年轉任上海暨南大學生物學教授兼系主任。奉派為第四次太平洋科學會議之中國代表前往印尼開會。 1933 年出版《南洋實業科學教育考察記》。 擔任南京中央大學生物學教授兼教務主任。
香港時期 1949~1955	1949 年移居香港。 任教於華僑工商學院、知行中學。 1955 年出版《天香書屋倡酬初集》。 曾參加香江詩社、大眾詞壇活動，並以郵簡發表作品於臺灣《臺灣詩壇》、《中華詩苑》。

(續次表)

時期	大事記
新加坡時期 1955~1968	1955年獲南洋大學聘任微生物學系教授，移居新加坡。 1956到1957年兼任南洋大學生物學系主任。 1956年至馬來西亞霹靂州、檳城遊歷。 1958年擔任新聲詩社籌備委員之一。 1958到1959年間擔任新聲詩社副社長。 1962到1964年間兼任南洋大學理學院院長。 1968年自南洋大學退休。
日本時期 1968~1985	1968年移居日本東京澀谷代官山。 1972年起參加斯文會、東京聖社漢詩會活動。 1979年獲臺灣中華學術院聘為詩學研究委員。 1980年擔任東京春秋學院顧問。獲菲律賓環球詞苑聘為名譽苑長。出版《天香書屋唱酬貳集》。

（二）時代嬗變下的詩友交遊

由前述可知，黎國昌一生經歷七個階段，生於中國、求學法國、返國後任職於廣州與上海、南京，戰後則輾轉於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但從他的詩集《天香書屋倡酬初集》、《天香書屋唱酬貳集》與相關文獻來考察，早年經歷少有詩作紀錄，直到「江浙時期」方正式開始作詩。其後「香港時期」與「新加坡時期」在創作與詩友唱和方面日益增加、作品數量最多，「日本時期」則唱和漸息。但值得探討的是，經歷多次移動的黎國昌是如何經營其文人圈？他是如何在新移居地營造新的文人圈？又是如何維繫過去的詩友人脈？而他在不同時期，與其唱和又有哪些詩人？這亦可在他的詩集中找到線索。

黎國昌在「江浙時期」，於上海、南京任職時，寫詩除自娛之外，也開始與詩友相互唱和。而黎國昌進入這個文人圈的方式，應是參加時興的詩人雅集，在其〈瞻園雅集〉一詩中就寫到：

滄波醜石繞迴廊，時序清和景色涼。到此名園三易主，更誰異姓再封王。
人來劫後偏多感，花到秋深接晚芳。盛會欣逢領元老，爭棋鬪酒意低昂。
(初集，頁3)

「瞻園」為南京名園，更有「金陵第一園」的稱號。在黎國昌筆下，這場在戰亂劫後所舉辦的詩人聚會，更有政治元老參加，而眾人在園中以詩、棋鬪酒，甚是風雅。此後，黎國昌也曾藉其夫人生日，作詩而向詩友索取和章，如他 1943 年〈杏萃七月十四生朝賦寄東京二首〉詩後，共刊載 14 名詩人和作，其中生平較為人所知者有陳鄰袁、²⁶陳寥士、²⁷程仰垓、²⁸龍沐勛、²⁹錢仲聯、³⁰陳善晃³¹等，這些詩人與當時南京文人圈有所淵源。但何以當時能有如此熱絡的唱和活動呢？或與在 1940 年代汪精衛政權的推動，在南京興起一波古典詩詞創作與詩人雅集的熱潮有關。正如尹奇岭在〈1940 年代南京汪偽統治時期古體詩詞的回溯〉中所言：

古典詩詞的唱和對這些人來說，是日常的常課，古典詩詞是他們之間可以相互分享的一種娛樂和雅事，作為一種文化權力資本，他們也在唱和中發展友誼，互相推重，共享這種文化權力資本。³²

因此在汪精衛政權統治下的南京與周邊地區，知識分子作詩言志，或是相互唱和都被視為是一種時尚雅事，作品也常見諸詩刊雜誌，更促進文人間的唱酬。而黎國昌處於當時的環境下，自然也結交一批詩友。或可說汪精衛政權時期南京文人

²⁶ 陳鄰袁，號獻湖。汪精衛南京政權時期曾參與漢詩唱和。

²⁷ 陳寥士（1898-1970），原名陳道量，浙江人，曾任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處主任。戰後遭到拘捕，不久後釋放。1945 年 11 月任南京明德女子中學國文教師，並在南京結社吟詩。

²⁸ 程仰垓，安徽人，數學家。1925 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戰後參與創辦河南新師範學院（河南師範大學前身）。

²⁹ 龍沐勛（1902-1966），字榆生，江西人。著名詞學家，曾任教於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1945 年因曾參與汪精衛政權而遭到判刑入獄，直到 1948 年保外就醫。

³⁰ 錢仲聯（1908-2003），名萼孫，以字行，江蘇常熟人。為清詩研究之大家，曾任教於大夏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45 年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

³¹ 陳善晃（1903-1968），廣西人。曾任南京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46 年擔任金陵大學化工系教授。

³² 尹奇岭：〈1940 年代南京汪偽統治時期古體詩詞的回溯〉，《東方論壇》第 4 期（2010 年 8 月），頁 90。

圈的雅集、贈和之風，成為黎國昌經營詩人交遊的進路。³³

此後在「香港時期」，黎國昌就以創造雅集空間與唱和機會的方式來交遊詩人。在港初期較多詩作是在抒發生活的甘苦點滴，少有唱酬之作。但在他跑馬地南華球場³⁴附近購買房產後，開始有較頻繁的詩人唱和。最初與梁寒操³⁵有所唱和，但在梁氏移居臺灣後就僅有書信往來。此後與周謙牧、³⁶劉耀墀、³⁷陳劫餘、張叔儔、丘覺廬、³⁸白良駒……³⁹等人交往密切，而黎國昌的寓所也成為這些詩人日常聚會、雅集之處。如他在〈贈座上文友一律〉的詩前小序即云：

課後自校返家，見周謙牧、陳劫餘、劉耀墀、張叔儔、袁伯琪諸公竹戲已三圍矣。攜肴備酒，興趣盎然。謙公起而誦曰「看竹何須問主人」即此之謂也。余既感盛情，共敦雅誼，即席率賦一律……（初集，頁19）

由此可見，黎家寓所已成這些詩人慣習聚會之所，縱使男主人不在也歡迎詩人前往。開放私家空間而成為詩人聚會的公共空間，任其飲酒、餐敘，甚至是打麻將。這種類似「沙龍」（salon）的聚會雅集空間，甚至在黎國昌輾轉遷居中環擺花街、⁴⁰西環羲皇臺⁴¹等地仍未停歇。黎國昌也曾藉夫妻二人生朝的名義宴請詩人，同時

³³ 然而，在此時期所結識的詩友，在後來的詩作裡皆未曾出現，或許與這些人在1949年以後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故而音書斷絕。

³⁴ 見〈尋山買屋口占二律〉。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17。

³⁵ 梁寒操（1899-1975），廣東高要人。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等。戰後一度避居香港，1954年遷居臺灣，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黎國昌詩集中在香港時期有〈梁寒操兄賜示近作步韻奉和〉、〈均默以香江冬至長句見示次答〉等作，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18-19。梁氏移居臺灣後，黎國昌亦曾作〈次和臺灣梁寒操翁六十生朝書懷六十章之首篇奉賀〉祝賀其大壽，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35-36。足見二人情誼未因分隔兩地而中斷。

³⁶ 周謙牧，為佛教居士，生平未詳。

³⁷ 劉耀墀（1895-1975），廣東香山人。後移居澳門，擔任澳門華商總會會長、鏡湖醫院董事。

³⁸ 丘覺廬，福建人，輾轉移居於香港、澳門之間，著有《覺廬詩存》。

³⁹ 白良駒（1924-2011），又名白福臻，戰後移居香港行醫，曾創立香港聯誼社並擔任主席。

⁴⁰ 在其〈九碗頭餉客有序〉云：「擺花街寓樓，假日詞人光聚。」（初集，頁19）

⁴¹ 見〈遷居西環山市街羲皇臺寄懷諸文友〉。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23。

舉辦雅集聚會，⁴²這也讓黎國昌在香港經營出新的文人圈。

在港時期黎國昌也參加當地詩社活動，如他曾自陳是香港健社詩會⁴³社友，在詩集中也收錄多首香江詩社、大眾詞壇的課題詩作與詩鐘作品，可見在港期間他積極參加當地詩社活動的跡象。此外，在港期間，黎國昌也開始運用郵寄詩作的方式，參加香港以外的詩人活動。如他《天香書屋倡酬初集》中有〈臺灣詩壇二周年紀念〉一作，亦見於1953年6月的《臺灣詩壇》。⁴⁴還有〈無題〉、詩鐘〈「風」「信」六唱〉、〈「詩」「友」七唱〉⁴⁵等作，即標明「臺灣六六詩社鐘課」等字樣。此「六六詩社」之詳情已不可考，但從現存記載可知是臺北的詩人社團。⁴⁶還有〈「春」「夜」七唱〉⁴⁷一作，後也標示「臺灣六六社春人社寄社聯徵選獎」的註解。由此亦可見在香港的黎國昌頻繁以郵寄方式參加臺灣的詩人活動。

透過參與當地詩社、雅集來融入本地文人圈，或是以郵寄方式與異地詩人取得聯繫，這二種方式更是黎國昌在「新加坡時期」建構其詩人交遊的方式。⁴⁸他與新加坡當地的李俊承、⁴⁹葉秋濤、⁵⁰謝雲聲、⁵¹陳寶書、⁵²許乃炎……⁵³等，透過

⁴² 見〈一九五四年內子杏莘生朝四章為壽〉、〈一九五四年生朝書懷〉、〈一九五五年內子杏莘生朝香港英京酒家四章為壽〉、〈一九五五年生朝述懷〉等作，當中皆附錄與會詩人之作品。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23-48。

⁴³ 健社詩會又稱「健社」，為香港當地的詩人社團，曾出版《健社集》（1953年）、《健社詩選》（1954年）、《健社詩鈔》（1974年）。見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續編：詩社集、詞社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79-85。（DOI：10.978.988237/2276）

⁴⁴ 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8。又見黎浩川：〈臺灣詩壇二周年紀念題句〉，《臺灣詩壇》第4卷第6期（1953年6月），頁12。

⁴⁵ 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9。

⁴⁶ 《基隆古典文學史》後之附錄記載：「施景崧（?-?）別號節宇、更疏，1948年定居基隆，臺北『六六詩社、春人詩社』社員。」可知「六六詩社」是曾經在臺北運作的詩社。見陳青松：《基隆古典文學史》（基隆：基隆市文化局，2010年），頁421。

⁴⁷ 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10。

⁴⁸ 黎國昌在新加坡時期並未開放自宅為詩人公共空間，或因當時住宅乃為南洋大學宿舍，未便於當中宴飲雅集。

⁴⁹ 李俊承（1888-1966），福建泉州人，後移居星馬經營橡膠業與金融業。歷任新加坡中華總商

雅集聚會逐漸形成文人圈，再加上同樣前來南洋大學任教的劉太希、⁵⁴蔡寰青……⁵⁵等人，最終在 1958 年創立「新聲詩社」。而對於新加坡以外的詩人，則透過郵柬方式取得聯繫，當時與之和答者如菲律賓蘇二菴、印尼黃松鶴、泰國張少庵、⁵⁶馬來西亞檳城管震民、⁵⁷沙巴張濟川、⁵⁸砂拉越詩巫姚峭嶽、⁵⁹劉鏡川……⁶⁰等人，皆為東南亞各地知名詩人。此外，黎國昌與香港地區詩友的聯絡也未中斷，另與陳璇珍、崔文龍、潘小磬……⁶¹等人也和作不絕。⁶²而這種以郵簡方式與詩友唱和的模式，也逐漸成為黎國昌交遊的主要途徑。

會會長、新加坡佛教總會主席、新聲詩社名譽社長。

- ⁵⁰ 葉秋濤（1906-1973），福建廈門人。1921 年秋隨父至新加坡經商，曾任新聲詩社社長。
- ⁵¹ 謝雲聲（1900-1967），福建南安人。於廣州中山大學研究院專門研究民俗學。1937 年赴新加坡任裕華國小校長，曾任新聲詩社社長。
- ⁵² 陳寶書（1902-1984），廣東潮安人，因經商移居新加坡。與詩友共同創立新聲詩社並擔任社長。著有《留星室吟草》。
- ⁵³ 許乃炎（1918-？），福建金門人，曾任新聲詩社社長。
- ⁵⁴ 劉太希（1898-1989），江西信豐縣人。1937 年投入抗日活動，任國防部秘書。戰後避居香港，1952 年應新加坡南洋大學聘請為中文系教授。後移居臺灣，先後任教於國立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東吳大學及淡江大學等校。
- ⁵⁵ 蔡寰青（1907-1970），廣東澄海人，曾任教於馬來亞大學、柔佛新文龍中華中學、南洋大學中文系。
- ⁵⁶ 張少庵，廣東潮安人，筆名商風，約於 1924 年移居泰國曼谷，著有《商風吟草》。
- ⁵⁷ 管震民（1879-1962），浙江黃岩人，後移居檳城，任教於鍾靈中學，檳城吟社成員，有「檳城詩翁」之譽。
- ⁵⁸ 張濟川（1926-2001），號神州客，廣東汕頭人。曾擔任《宇宙光報》社長，後移居沙巴，任教於山打根中華中學、聖瑪麗中學中文部，並主持婆羅洲詩壇、神山吟苑、北婆國風吟苑。晚年移居新加坡，曾任新聲詩社社長，並發起成立「全球漢詩總會」。
- ⁵⁹ 姚峭嶽（1879-1979），號晦廬，福建古田人。1916 年移居位於婆羅洲砂拉越的詩巫，擔任中學教師、牧師與中醫師等職，曾擔任詩潮吟社社長。
- ⁶⁰ 劉鏡川（1904-1975），福建閩清人，二戰後移居砂拉越的詩巫。後接任詩潮吟社社長。
- ⁶¹ 潘小磬（1914-2000），號餘菴，廣東順德人，曾任教於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學海書樓、樹仁學院，教授駢文、詩選及應用文。著有《餘庵詩草》、《餘庵詩餘》、《余庵文存》、《余庵詞》、《余庵游草》。
- ⁶² 雖然這些詩人皆標示其詩寄自香港，但於《天香書屋倡酬初集》中未見唱和之作，故附於新加坡時期論之。

至於黎國昌在日期間，最初曾參與當地斯文會、東京聖社漢詩會的活動，與結識的漢學家高田真治⁶³（楷菴）、安武政敏（櫨山）與新田興（雲處）等人唱和。但是當高田真治、新田興⁶⁴等人相繼過世後，復因自己身體欠安，逐漸減少參與雅集唱和。但另一方面，透過郵柬與臺灣、菲律賓、新加坡等地的詩友互動的情況仍相當頻繁。如時任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所長易大德⁶⁵在〈天香書屋唱酬貳集序〉中提到：「曩因道堅先生之介，獲交慎老詞丈，今二年矣，猶未得一識荊州。」（貳集，頁2）可見期間只有書信往來，並未親自會晤。又如鄭子瑜⁶⁶在「翦春齋詩紀」中刊登黎國昌在1975年寄給他的親筆信，當中錄示其〈乙卯九月二日即事有作〉⁶⁷一律，黎國昌陳述自己沉浸在師友切磋與天倫之樂中，備感歡欣。後更寄鑽石婚紀念詩八首給鄭子瑜，而鄭氏因此奉答。⁶⁸此外如《天香書屋唱酬貳集》裡〈送承美日菲泰馬星洲香港臺灣各地文友次和己未元旦題句再用前韻分柬奉酬〉、〈菲京黃箴士環球詞苑苑長戊午夏寄示與泰京張少庵詞長唱酬瑤韻展誦之下依玉急就奉答並分柬泰京〉、〈己未秋中華學術院張其昀院長聘充詩學研究委員奉呈一律用酬雅誼並分柬易大德詩學研究所所長同正〉等題，⁶⁹更可見黎國昌晚年透過書柬，與美國、日本、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香港、臺灣等地詩友唱和，繼續其跨國詩人交遊的熱絡。

⁶³ 高田真治（1893-1975），曾任東京大學教授、名譽教授。時任東京聖社漢詩會盟主。

⁶⁴ 黎國昌有〈陶軒博士高田真治教授大宗師千古〉之作，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96。又有〈前國士館大學漢學研究室主任新田興教授千古〉之作，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97。

⁶⁵ 易大德（1910-？），江西宜春人。畢業於私立上海法政專科學校、中央陸軍軍官校第六期第二總隊步科。歷任軍隊要職，戰後初期官至國防部政工局第一處處長、陸軍總司令部政工處處長。1949年任臺灣北部防守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69年以中將退役。後擔任國大代表、國民黨黨部常務委員、中國文化大學副校長、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所長等職。

⁶⁶ 鄭子瑜（1916-2008），原籍中國福建，後移居新加坡，著有《中國修辭學史稿》、《詩論與詩紀》。曾於日本中央大學、早稻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復旦大學講學。

⁶⁷ 此詩另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95-96。題作〈乙卯秋喜見卅多年久別之小女滬娟有作〉。

⁶⁸ 鄭子瑜：《詩論與詩紀》（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頁149-150。

⁶⁹ 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100。

三、詩用實踐的時代情境與類型

綜觀黎國昌一生創作，與詩友贈答唱和之作佔了相當多的份量。何以黎國昌能有如此大量，甚至是跨國的詩友與之唱和？當時的社會情境又對他們的唱和內容產生甚麼影響？以及黎國昌在與詩友唱和間，如何展現漢詩的唱和在當時代的作用？要解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從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天香書屋唱酬貳集》的內容，並參考當時發表於詩刊雜誌如《中華詩（藝）苑》、《亞洲詩壇》的版本來探討。另參酌顏崑陽在〈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爲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一文中所論述，進一步探究詩歌唱酬的「詩用」產生的社會文化情境、唱酬的型態與作用等面向，以期能對黎國昌與其詩友的唱酬行爲與內容有更立體的詮釋面向。

（一）變局下的社會文化情境

黎國昌之所以能與跨國的漢詩人相互唱和，能有此多的詩人群體，其背後應有時代背景的因素所造成。因詩作唱酬多是雙向的，如贈詩對象並非擅長此道者，就算有回覆之意也難以成詩，在文獻上就成了單方面的贈詩而未有唱和之舉。正如顏崑陽在〈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爲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中所言：

這種行爲模式要能達到社會「互動」的效用，就必須知識階層依藉普及化的「教養」，而共同定義出基底性的「社會文化情境」。⁷⁰

然而，與黎國昌相唱和的詩人們散布在香港、臺灣、東南亞各地與日本等地，是甚麼因素造成他們有普及的文化教養，才形成無礙地以漢詩進行唱和的「社會文化情境」呢？這或許可從與黎國昌相唱和的詩人一生中獲得解答。

⁷⁰ 見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頁 268。

從這些詩人的生平背景可考者著手，進而探究其養成之文化背景。在「江浙時期」與黎國昌唱和的詩人，如陳寥士（1898-1970）、龍沐勛（1902-1966）、陳善晃（1903-1968）、錢仲聯（1908-2003）等人大致出生於清朝時期；「香港時期」如劉耀輝（1895-1975）、梁寒操（1899-1975）也約略出生在清朝乃至於民國初年。而在港時期寄贈當時人在臺灣的鄭品聰（1902-1971）、⁷¹曾今可（1901-1971），也是同一時期的人士。至於「新加坡時期」與之唱和的人士中，如李俊承（1888-1966）、謝雲聲（1900-1967）、陳寶書（1902-1984）、葉秋濤（1906-1973）、蔡寰青（1907-1970）、許乃炎（1918-?）也大致生於清末民初。就連在「日本時期」唱和的高田眞治（1893-1975）也是如此。這些詩人與黎國昌（1892-1983）的出生時代相當，可推知當時漢詩仍為這些詩人幼年時期相當重要的文化教養之一，也呼應了黎國昌在《天香書屋倡酬初集》〈自序〉言：「憶余少承家學，於詩文雖稍窺門徑」⁷²的說法，在清末民初出生的知識份子，漢詩文仍為其文學養成的基底。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二次大戰戰後初期的東亞、東南亞地區，乃至於美國等地，當中不乏有擅長漢詩者，甚至形成一個特殊的詩歌交流圈。如1959年發刊於臺灣的《亞洲詩壇》雜誌，就結合了臺灣與日、韓、越、寮、泰、緬、印、菲、星、馬與港澳等地的詩人與詩社組織而成。其他如《臺灣詩壇》、《中華詩（藝）苑》等詩刊雜誌，也不乏有美、日與東南亞各國的漢詩人投稿。由此更可見，漢詩在此時期仍為這些地方知識分子所受的教養之一，進而以此為基底產生一個可以對話的「社會文化情境」。⁷³

⁷¹ 鄭品聰（1902-1971），名錦豪，字品聰，號劍侯，福建龍巖州人。早年留學日本，1918年曾一度來臺，七七事變後返鄉。戰後再次來臺，先後擔任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屆立法委員等職。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第51卷第4期（1987年10月），頁138-139。黎國昌有〈鄭品聰詞長寄示五十生朝次答奉祝〉一詩，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10。

⁷² 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頁3。

⁷³ 這種以漢詩文為書寫語言的「社會文化情境」並非華人所獨有，戰後東亞部分地區在過去曾受漢文化影響者，亦多有當地族裔身分的漢詩人。如《亞洲詩壇》中的詩人除旅居各地的華裔詩人外，亦多日本、越南、韓國等地之詩人參與其中。這與當地歷史發展有關，如日本德川幕府

有了可以對話的共同社會文化情境為基底，黎國昌得以進一步在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與當地詩人唱和，更可藉由郵件通訊與臺灣、東南亞等地詩人相互應酬。再透過相同經歷的某些「事件情境」來創作唱酬詩作。⁷⁴而在黎國昌的唱和作品中，隱隱也透露他與華人詩人間，有一個具時代意義的共同「事件情境」。這個「事件情境」與戰後中國文人逃離中國大陸，轉進香港、臺灣與東南亞等地的「離散」情境有關，而黎國昌自己就是其中一員。例如他在〈均默以香江冬至長句見示次答〉一詩中所展示的：

研磨忠義硯勤耕，千首能將萬戶輕。遯跡塵中調玉液，放懷世外納滄瀛。
寒凝大地繁花盡，望重懸崖古木貞。如此心情如此世，最難風雨應同聲。
(初集，頁 19)

此詩為次答梁寒操之作，但詩中的意象幽微，如單就此詩而言，將難以理解當時的「事件情境」為何。不過若參照梁寒操〈香江冬至日〉的原作，就能有更清楚的見解：

北地民多嘆輟耕，隱身島國感寒輕。陽生漸有葭灰躍，秋去還瞻菊蕊英。
卦象剝窮終見復，天機元起每隨貞。人間兔鶻尋常⁷⁵事，滾滾千年海浪聲。
(初集，頁 19)

在戰後初期避居香港的梁寒操，陳述自己在冬至這天因身在南方的島國而感受不

時期武士階層雅好漢詩，朝鮮李朝、越南阮朝皆重儒學、科舉取士，這都讓漢詩書寫於當地傳行。這與近代華人離散下的「跨域文化」有歷史脈絡上的不同，故本文以此詮釋黎國昌與華人、日人之間漢詩唱和的基礎。

⁷⁴ 正如顏崑陽所述：「在這種知識階層共享的社會文化情境基底上，一旦互動的事件發生了，雙方便會因文化習慣與既存知識而相互定義出一個可意會的『事件情境』來。」見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頁 269。

⁷⁵ 原文作「嘗」，書後所附勘誤表已訂正為「常」。

到冬天的氣息。不只還能看到應在秋盡時凋零的菊花，更已出現春天來臨時的徵兆。這讓梁寒操想到，在《易經》裡大凶的「剝」卦之後隨之而來就是復甦的「復」卦，有萬物開始的「元」就有萬物告成的「貞」，⁷⁶強調冬至之後就是即將回春的徵兆。更強調人間局勢的轉變常常像兔起鶻落一般迅速，亦如千年來的浪濤般從未停歇。當中隱含自己想起身反抗中共政權，讓局勢由如同冬至嚴寒轉變成和煦春天的意念。這些中國文人當初選擇離開、留滯海外而非投身於中共政權，原本就帶有自己的政治傾向與選擇，因此對於中共政權自是抱持反抗的態度。

從梁寒操原作就能更清楚理解同樣避居香港的黎國昌次答之內容。詩作開端讚許梁寒操致力於作詩硯耕，是磨練自己忠義之心的表現。雖然隱居在塵世裡只能藉詩酒排遣，但仍有著如海洋一般的廣闊心胸。在世間局勢有如寒流壟罩大地而百花盡落的時刻，他敬重梁寒操就如同懸崖上的古木般維持自己的堅貞。詩末則表達自己對梁寒操心情與意志的嘉許，在風雨飄搖的艱難時刻與其同聲相應。離開中國大陸而避居香港，則是二人可以相互意會的「事件情境」。

有「社會文化情境」為基底，再加上自中國離散至各地的「事件情境」，讓黎國昌特別能與香港、臺灣與東南亞詩人產生共鳴。就算未能親身晤面唱酬，也能將詩作透過郵寄的方式寄予對方。由於詩作所描述的事件情境能有所共鳴，也每每獲得各地詩壇的回應與認可。如前面曾述在「香港時期」的 1955 年寄到臺灣，發表於曾今可⁷⁷所主持的《臺灣詩壇》第 4 卷第 6 期〈臺灣詩壇二週年紀念題句〉詩中所言：

過江讀史憐名士，守島今欣聚勝流。風雅提倡心不懈，東南相望道同謀。
二年詩教成鄒魯，一炬書焚恨敵仇。願借騷壇扶正氣，筆鋒橫掃復神州。
(初集，頁 8)

⁷⁶ 如程頤《易程傳》中所言：「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宋）程頤：《易程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頁 3。

⁷⁷ 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1945 年以臺灣行政幹部訓練團講師及《申報》特派員身分來臺，陸續創辦《正氣月刊》、《建國月刊》、《臺灣詩報》、《臺灣詩壇》等雜誌。

詩中由離散這個共同的事件情境出發，描述南渡的名流文士據守臺灣島，對於風雅詩文的提倡不曾間斷，與身在香港的自己遙遙相望而有相同的意念。詩的後半段更讚許《臺灣詩壇》只有發刊兩年卻能凝聚詩人，成為文化之地，來對抗焚書而摧毀文化的仇敵。希望藉由這份刊物培養正義之氣，期望未來能反攻中國大陸回到過去故土。

由於有著共同的「事件情境」，讓黎國昌得以在作品中表達適切的情感，再透過郵件寄發或是親身互動，進而快速打入戰後的離散詩人群體。在詩人雅集的現場，更是詩人們透過會面、交流而產生共同情境的場域，而詩歌的唱酬更帶有情境當下群體的「隱性意向」，⁷⁸或可以此進一步深入剖析詩作內涵。例如在《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有黎國昌在新加坡時期寫的〈戊戌詩人節雅集〉之作，詩云：

久愛郊居不入城，怪教衝雨赴詩盟。逢辰高會懷前哲，慨世千秋起共鳴。

艾酒朮羹忘舊習，鐘鏗鉢韻振騷聲。便應角黍家家遍，弔古人同雅俗情。⁷⁹

這次詩人節雅集盛會，在當時新加坡《南洋商報》亦曾報導，⁸⁰且報導中言此題就是黎國昌所出的。黎國昌為何提出這個題目？對當時的詩人社群有何意義？或可從詩作的解析中得知。詩作開端陳述自己冒雨從南洋大學所在的郊區入城，為得就是參加詩人聚會，一同在端午節懷念先哲屈原，與詩人共同唱和。然而，當中何以言「慨世千秋起共鳴」？可見在當時的聚會中，詩人間因為詩人節憑弔屈原

⁷⁸ 正如顏崑陽所言：「發言者乃依此共定之『情境』，運用『比興符碼成規』，為自己的『隱性意向』製碼，而發言為『文本情境』，並傳達給對方。」「受言者也依共定之情境去感知訊息，並依『比興符碼成規』進行『文本情境』之解碼，完成『隱性意向』之詮釋而相對給予『回應』。」見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頁270。

⁷⁹ 見黎國昌：〈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1959年7月），頁30。此詩亦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30，題目作「冒雨赴星市大東酒樓參加詩人節雅集有作」，字句略有不同。

⁸⁰ 不著撰人：〈端陽節詩人雅集大會籌組“新社”改稱“新聲詩社”並推舉籌備委員多人〉，《南洋商報》第6版，1958年6月23日。

有了一些共同的想法。然而詩中何以言「艾酒朮羹忘舊習」？又何以最後要說「便應角黍家家遍」？如欲更進一步深入了解黎國昌詩作之意，或可從當時參加同一場聚會的其他詩人的詩作中得到其當下群體的「隱性意向」。如當時同詠的陳振夏⁸¹有「五月詠歌沿舊習，千秋佳節弔詩人」、⁸²曾志遠⁸³則言「騷壇午節動吟衷，喚起詩魂振國風」⁸⁴這當中即是強調在端午節的這天祭弔屈原的同時，更應沿襲固有的漢詩文化，提振文化風氣。由此更可進一步詮釋黎國昌詩中的深度意涵，他認為縱使人不在中國大陸、離散在海外，⁸⁵更不能忘記過去的文化傳統，除了應該維繫艾酒、朮羹等端午習俗，還要持續創作詩歌來繼承《離騷》的傳統。世俗民間以角粽等食物懷念過去的歷史，而詩人則以詩歌祭弔古代的屈原，同樣表達一個不忘文化傳統的意念。有著這層意涵，就更能理解黎國昌在詩前以「怪教衝雨赴詩盟」自陳縱使自己久不入城，就算冒雨也一定要參加這場結成新聲詩社的詩人聚會，就是他認為這對維繫文化傳統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參照當時參與唱和的其他詩人之作品，將可更清楚當時情境下所存在的「隱性意向」，讓詩人群體當下的精神樣貌更加立體化。對於同時唱和的作品也能形成相互參照的互文，讓彼此詩歌意涵的詮釋能更加飽滿。

（二）詩歌唱酬中的詩用實踐

有著共同「社會文化情境」的同時代詩人，面對共同的「事件情境」，透過漢詩隱微編碼文字與彼此能理解的「隱性意向」相互溝通，形成一個以詩歌相互唱和的溝通管道。而通過這個管道所創作的唱酬作品，有存在甚麼功能呢？顏崑陽認為詩歌唱和所形成的「社會文化性功用」，存在著三種「次類型」：諷化、

⁸¹ 陳振夏（1911-1987），新聲詩社發起人之一。

⁸² 見陳振夏：〈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1959年7月），頁30。

⁸³ 曾志遠，中醫師，新聲詩社發起人之一。

⁸⁴ 見曾志遠：〈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1959年7月），頁30。

⁸⁵ 同時與會的葉秋濤詩中有：「逸客登瀛洲十八，征塵度越路三千」之語，或顯示當時參與這場盛會的詩人，其實都是離開中國而離散至新加坡者。見葉秋濤：〈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1959年7月），頁30。

感通、期應，即是這些作品的功能。當中所謂的「感通」，顏崑陽在〈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爲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解釋道：

「感通」行爲發生於個體交往場域中，彼此感發、溝通內在的情志，春秋時代，大夫交接鄰國的「賦詩言志」，或歷代文人之間、男女之間以詩喻示情志的「贈答」行爲，歸入此類。⁶⁶

「感通」應是詩人間唱和之作最常肩負的功能，在前述黎國昌於雅集聚會、私人贈答之作多屬於此。然而這項功能並非只能呈現詩人間的私人情誼，更會透露當時的時代氛圍與群體感受。如前所述，黎國昌自身所經歷的離散經驗與身分，讓他在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唱酬時，與當地有相同際遇的詩人能相互理解、同聲唱和，此即在相近的「社會文化情境」爲基底，通過相同的「事件情境」而產生的「感通」行爲。例如黎國昌在 1958 年的〈戊戌重九龍山雙林寺登高口占一律〉詩中道：

綠國常春葉不凋，江南草色漫虛驕。逢辰醉眼憑高望，來歲閒身孰健招。
翠靄晴嵐山遠近，迷離海市浪飄飄。浮生六七更寒暑，屢插茱萸劫未消。
(貳集，頁 32)

詩中提到他根據中國古代的習俗在重陽節這天登高望遠，但舉目所見卻是熱帶南國有如江南暮春的翠綠，遠方海濱的浪花更提醒六十七歲的自己流離的身分。離開中國多年來，屢屢在重陽節佩帶祛病驅邪茱萸，卻難以消去讓他離開家鄉的劫難。這首詩後則收錄了新加坡詩人陳寶書的次和：

南島蕉椰秋不凋，重陽景物似春嬌。登高非教仙人術，探勝難忘隱士招。
萬里乘桴徒鳳歎，卅年去國等蓬飄。天涯亦有茱萸感，鬱鬱煩愁待酒消。

⁶⁶ 見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頁 262-263。

(貳集，頁 32)

詩作首句充分回應黎國昌前作所描述的景象：在熱帶的新加坡，重陽節亦有如春天。詩後進一步抒發自己離開中國三十年，乘船來到萬里外的新加坡，內心對此地仍沒有穩定的歸屬感。因此他對黎國昌詩中對茱萸的感觸特別有共鳴，只待有酒來消除思鄉的煩悶，隱隱有邀黎國昌更飲一杯酒的意涵。由此也可看到陳寶書透過詩歌陳述自己與黎國昌相同的境遇，進而在心意上相互「感通」的唱酬行爲。

除與新加坡當地詩人以此唱酬外，東南亞各地多有離散的華人，也讓黎國昌得以用自己離散的感受與這些詩人相互感通。如他在〈張少庵詞長步和南大家居即事肩一律見寄再疊奉酬〉詩中說：

異地神交豈偶然，千山萬水契詩緣。劇憐浮海長年客，望斷齊州九點烟。
授館懸壺當劫後，乞廬編籍⁵⁷向人前。林泉遣興知同趣，酒榼奚囊未息肩。

(貳集，頁 36)

此詩爲贈和回覆給當時旅居泰國曼谷的張少庵，從現有的文獻來看並未到新加坡與黎國昌會晤，也不知二人何以能成爲相互唱酬的詩友。不過黎國昌詩作開端就透露二人之所以能如此契合的原因，就是由於二人皆是長期流離於海外，卻每每懷念著遙遠的故鄉中國。二人離開中國後，一個授課教書以求暫居之所，一個懸壺濟世成爲異國國民，相同的都是用悠遊山林、飲酒作詩來排遣內心的鬱悶，故而相當契合。以此觀之，對於臺灣、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同樣面臨離散情境的詩人，黎國昌都因有相同的事件情境而有相似的感發，進而在詩作中進行交流彼此情意的「感通」之舉。

在黎國昌現存的唱酬作品中，除了自中國離散至海外的「事件情境」是多數與之唱和的詩人所關懷者，此外還聚焦在與南洋大學相關的「事件情境」上，當中也顯現了在「感通」之外的「期應」還有「諷化」的詩用功能。所謂的「期

⁵⁷ 原文誤作「籍」，今改正為「籍」。

應」，顏崑陽解釋道：

「期應」則發生於個體交往場域中，一方面以詩喻示某項利益的「期求」，而另一方則以詩喻示或迎或拒的「回應」，含有這種意向性的「贈答」行為歸入此類。⁸⁸

而這種含有意向性的贈答或應考慮對方並非詩人的情況，其期求或回應並非以詩文方式呈現，在文獻上形成或是單方面的回應對方的期待，或是以詩歌唱酬的方式用作品彼此回應的兩種情況。黎國昌在唱酬詩作中展現「期應」面向者，如〈一九五六年丙申春南洋大學第一屆開學典禮呈陳六使主席〉一詩，其詩云：

桃李門牆雨露綿，蠻花犵鳥襯春妍。文翁興學推殊俗，卜式輸財仰眾賢。
萬里遙荒成業遍，百年大計樹人先。驂騮開道叨隨後，吾道其南願勉旃。
(貳集，頁 17)

陳六使為南洋大學的創辦人，除出資作為建校基金外，更遴選、聘請黎國昌等諸多學者至新加坡講學。詩中描述在百花盛開的春天，南洋大學得以開學，就是陳六使如西漢文翁興學般提倡，再加上他與其他華人像卜式一樣捐款，才得以實現。詩作後段繼續說道，既然華人在這距離中國萬里的地方成家立業，為了未來更應重視後輩的教育。有這些前輩開道，黎國昌自身願意追隨這樣的意念。既然已應聘來到這南方的新加坡，對學生的教育自當勉力為之。這首詩一方面是向陳六使抒發自己內心的感佩，另一方面也是回應陳六使⁸⁹聘用自己擔任南洋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器重。陳六使輸財興學的意志，得到黎國昌以詩歌贈答來給予具體的回應，此正是詩歌唱酬的「期應」表現。

⁸⁸ 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頁 263。

⁸⁹ 陳六使（1897-1972），福建同安人。少時移居新加坡，後創辦橡膠公司致富。戰後創辦南洋大學，並擔任理事會主席。1963 年因親中立場，遭新加坡政府褫奪其公民權。

而當時身在南洋大學任教的黎國昌，在詩人唱和的過程中，也發生被當地詩人「期應」的情況。如他在搬入南洋大學宿舍時寫下的〈遷居南洋大學教授住宅三絕漫興〉三首，當中其三寫到：

生涯自笑同鳩拙，廣廈新成暫寄身。收拾雄心閒遣興，⁹⁰魚蟲箋註作痴人。⁹¹

黎國昌回想自己的前半生有如不擅築巢的鳩鳥般流離各處，想不到能在新加坡南洋大學能有新建的華廈可以暫時安身。因此想就此收起雄心壯志，專心從事生物學的研究工作。這原本是黎國昌身為學者，希望在安穩的環境裡專注於自己本科研究的心願。只不過，新加坡當地的詩人對他的期許不僅如此，故而李俊承次和一首云：

綠野絃歌氣象新，空前任重在君身。發揚生物淵微理，師範炎州第一人。
(貳集，頁 19)

詩中應是描寫南洋大學在綠野中草創，開展新的氣象，而空前的重任就降在黎國昌的身上，期盼他能更進一步發揚生物學的細微之理，為當地學生帶來好的示範。這首詩表現出對黎國昌，乃至於南洋大學對當地教育的重要性。詩末「師範炎州第一人」之語，更是期許黎國昌成為新加坡教育的典範。面對李俊承深重的期盼，黎國昌又作了〈疊遷居三絕中真韻一章而倒填韻次呈李俊承詞丈〉一詩以為回應，並在詩前作小序道：

李文前次答遷居南大教授住宅真韻一章有「師範炎州第一人」句，獎勉情

⁹⁰ 黎國昌：〈遷居南洋大學教授住宅三絕漫興〉，《亞洲詩壇》（港版）第 1 集（1963 年 9 月），作「垂老日」。

⁹¹ 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 19。此詩亦可見同前註，頁 19。

般，益增愧怍，因反其韻次，並易身字為塵字報和一章表為意耳。（貳集，頁 20）

倒韻疊和本為詩人間唱酬常見的模式，但將當中的字眼抽換卻不常見。黎國昌以「塵」字代替「身」字，似有此身如塵、毋庸貴重的謙退之意。其詩云：

我本江湖一散人，偶逢青眼向風塵。翩翩鴻影將焉息，又見泥痕爪印新。
（貳集，頁 20）

詩作開端同樣自謙本是江湖閒散之人，正好有陳六使、李俊承等當地人士的青睞，讓他這個風塵碌碌之輩，在原本預計退休之際又來到新加坡留下新的足跡。詩中雖未正面回應李俊承的期許，但詩中展現謙遜的謝意，感謝李俊承的青眼相待。只不過其後又有洪來儀次和的「庠序今朝宏展布，菁莪沐化幾翻新」、洪鏡湖次和「他時造就成棟樑，供仰昌黎善作人」（貳集，頁 22）等語，更可見當時新加坡當地人士對於南洋大學，以及前來任教的黎國昌，期待能為當地教育帶來活力，造就國家未來的棟樑之材，故而在詩作唱酬中給予深深的期許。

在黎國昌南洋大學相關的詩作裡，亦可見在「期應」中帶有「諷化」的情況，從中得見在南洋大學歷史的另一面向。顏崑陽對於的「諷化」解說是：

「諷化」的行為發生於政教場域中，下對上以詩諷喻，或上對下以詩教化，凡此行為皆歸入此類。⁹²

書中以晏子對齊景公的諷諫與《詩經·關雎》的教化功能為例，來說明這樣的例子在古代文獻有相當多的記載。而在黎國昌的唱酬作品中，也可見這種「諷化」的作品。大致作於 1965 到 1966 年間⁹³的〈魏雅【聆】⁹⁴教授以七絕一章見貺感動

⁹² 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頁 262。

⁹³ 因此詩前面有〈一九六五年乙巳春參觀星洲花展漫興一章〉，後有〈一九六六年丙午秋題畫堂

心弦奉酬二律〉，就顯現了詩歌唱酬的「諷化」作用。在此詩後所附的「魏雅聆詞長見貺原作」，其詩云：

白雪調高愧未能，鄭衛淫亂忍聽聲。桃李凋零隨水去，春風回顧幾多情。
(貳集，頁 64)

此詩若不仔細探究當時事件情境，就難以理解當中緣由。首先，詩末所謂的「春風」當指黎國昌。在黎國昌〈別南洋大學同寅學友各地文友及鄉親十五律〉後，附有魏雅聆之和作，裡面有「春風到後盡芳菲，掛冠濯纓底事歸」（貳集，頁 76）之語，可見此處之「春風」當指黎國昌。而「桃李」當是指南洋大學的學生。⁹⁴但學生何以「桃李凋零」？其實在此前，新加坡政府與南洋大學師生間就存在相當緊張的關係，不僅南大文憑不被承認，更多次派軍警進入南洋大學逮捕學生、查禁刊物，還在 1963 年宣布褫奪南洋大學理事會主席陳六使的公民權。在 1966 年實施新學制前後，多次遭到學生抗議，進而引發軍警入校逮捕學生，或開除學籍，或驅逐出境。⁹⁵對於這些紛擾，魏雅聆將之比擬為「鄭衛」之聲，為亂世之音。其後應是勸黎國昌毋須對這些學生過於多情看顧，讓學潮的紛擾隨著時間而消逝。面對魏雅聆的勸誡，黎國昌則以詩回應：

猶記南園初識荊，到今七載仰高明。東山倘許公車逐，西序相將倒屣迎。
一曲陽春絃外意，十年化雨熱中情。遑憐桃李隨流水，不斷颱風掃落英。

幅奉賀鄧銘正教授薦遷自置新居〉，可知當作於此二年間。

⁹⁴ 原書缺此「聆」字，依後附詩文增補。

⁹⁵ 魏雅聆和作又有「春風去後事日非，乘槎浮來又賦歸。留下桃李三千眾，恐有奇葩照落暉。」由此可知「春風」乃指黎國昌，而「桃李」應是指南洋大學學生。

⁹⁶ 見不著撰人：〈南大生反改制大罷課〉及〈1966 南大學潮〉，多倫多南洋大學業餘網 (<http://www.nandazhan.com/>)，2000 年 12 月 23 日及 2000 年 12 月 25 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4 日。）

南園景色負晴明，山鳥秋瘖促織鳴。屢見講堂屯馬隊，許教學府變兵營。
膠庠月旦評三度，翻覆贏輸局幾枰。⁹⁷未撤臯比寧伴食，留將老眼閱枯
榮。⁹⁸

在第一首詩作開端表明他第一次見到魏雅聆是七年前，正好是 1959 年新加坡政府委託魏雅聆組成委員會，檢討南洋大學改制問題的時刻。其後提出著名的「魏雅聆報告書」成爲南洋大學改制的方針，但也引起該校學生的反彈，自此掀起多次抗議與軍警入校逮捕學生之事。因此黎國昌聽見魏雅聆詩中的「絃外意」，故而回應對學生的眷顧是黎國昌十年來任教於南洋大學所秉持的熱情。詩末更回應魏雅聆不用假意悲憐學生的處境，因爲持續不斷的風波還持續侵擾著學生。由此看來，詩中「仰高明」、「一曲陽春」等語以及詩題中「感動心弦」等語，實爲反諷其言，帶有「期應」中抗拒的意味。⁹⁹在第二首詩中，黎國昌更帶入當時情境以明志。描述在晴朗的秋天，南洋大學的校園卻呈現陰鬱的景色，因爲軍警數度進駐南大講堂，而且校務也經三次評比，正如詩末註腳所云：「南大近年迭被軍警駐紮¹⁰⁰拘捕，又五年間政府曾三度組派評審。」正是描述當時新加坡政府陸續派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賡武等人，三次組成委員會對南洋大學的校務發展提出評判與建言。這首詩表面上是回覆魏雅聆的詩作，但實際上應是背後的新加坡政府提出諷諫。自陳自己在軍隊未撤出前，¹⁰¹寧願終日無所事事進行消極的抵抗，冷眼旁觀其後的發展。這則是對魏雅聆以及當時新加坡政府的諷諫，在回應魏雅聆

⁹⁷ 原文誤作「秤」，今改之。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 76。

⁹⁸ 見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頁 64。

⁹⁹ 前一首詩中「東山倘許公車迓，西序相將倒屣迎」之語，於詩末有註提到：「魏博士久任新大醫學院教授，聞迭被邀出長南大，始終未允。」然考察詩意，似有小校難請大賢的諷刺意涵。詩中「東山」乃取自晉朝謝安出任前曾隱居東山之典故，「西序」則出自《禮記·王制》的鄭玄注：「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漢）鄭玄著，（唐）孔穎達疏：《禮記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 冊），頁 296。

¹⁰⁰ 原文作「札」，今改之。

¹⁰¹ 「臯比」一詞有武將的座席、亦有教師講席之意，黎國昌或以此表示軍隊未撤離之前，或是自己的講席未被撤銷之前。此處暫取前者之意。

詩作的同時加以「諷化」。

四、結語

綜觀黎國昌一生與其詩文著作，其習詩始於家學，然此後至北京、法國求學，繼之任教於廣東中山大學，其心力皆投注在生物學，對詩學並未進一步涉獵。直到壯年於揚州、南京、上海等處遊歷時，方專注於作詩，並與詩友相互唱和。繼之家國動亂，自身流離至香港，心有所感輒形諸筆端，化為古典詩篇。在港期間更開始投入詩社活動，對課題詩與詩鐘作品多有斬獲，更曾郵寄詩篇參與臺灣詩社課題，並與臺灣詩友唱酬。1956年應聘至新加坡的南洋大學任教，不只是黎國昌學術事業的另一個高峰，更是他在東南亞漢詩壇拓展詩名的時期。與新加坡詩友共創「新聲詩社」，後更被推舉為名譽社長，成為當時新加坡詩人的代表人物之一。與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及港、臺等地著名詩人的筆墨往來，也可見當時黎國昌與詩友唱酬之盛。

在黎國昌所著的《天香書屋倡酬初集》、《天香書屋唱酬貳集》中，就可見他在香港與新加坡時期與詩友唱酬之盛況。之所以能形成這種相互唱和的情況，與當時東亞、東南亞地區文人，在其基本素養中仍有閱讀或寫作漢詩的基礎。由黎國昌與其唱酬詩人的年紀相近，可推知漢詩在十九、二十世紀交界之際，仍是東亞、東南亞各地華人或日人所熟習的素養，有著共同的「社會文化情境」，成為日後詩文唱酬的基礎。而在黎國昌的唱和作品中，則可見他與東南亞華人詩人對於自中國離散至海外各地有著共同的感觸，進而在詩歌唱酬之間得以產生共鳴。這即是有共同的「事件情境」，才使得雙方聚焦於此，形成唱和時的共同話題。特別在新加坡時期，南洋大學所產生的「事件情境」更是黎國昌與當地詩人唱和時的話題，無論是對南洋大學興辦、教育的期許，或是往後的紛擾，都一一在詩作唱和中浮現。由黎國昌與其詩友的唱和之作裡，可看到漢詩的「詩用」實踐在「感通」、「期應」與「諷化」等面向，在當時滿足個人交誼的詩用功能之外，後人更可藉此一窺當時詩人心中的精神樣貌與時代反應。

附錄：黎國昌相關圖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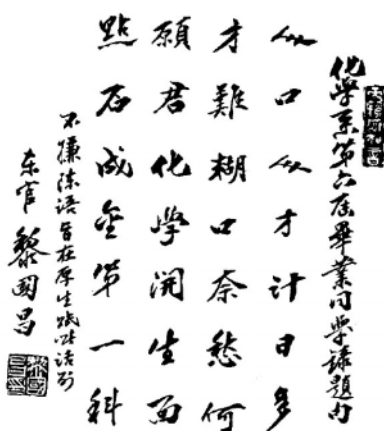
黎國昌照相¹⁰²



《天香書屋倡酬初集》封面¹⁰³



黎國昌墨跡¹⁰⁴



黎國昌墨跡¹⁰⁵

¹⁰² 摘自南洋大學化學系：《南洋大學化學系第六屆畢業班紀念刊》（新加坡：南洋大學化學系，1964年），頁8。

¹⁰³ 此為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館藏。

¹⁰⁴ 摘自南洋大學化學系：《南洋大學生物學系第六屆畢業班同學特刊》，頁9。

¹⁰⁵ 同前註，頁8。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毛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 (漢)鄭玄著，(唐)孔穎達疏：《禮記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冊)。
- (宋)程頤：《易程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南洋大學化學系：《南洋大學化學系第六屆畢業班紀念刊》(新加坡：南洋大學化學系，1964年)。
- 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吉隆坡：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1990年)。
- 馬崙：《新馬文壇人物掃描》(吉隆坡：書輝出版社，1991年)。
- 黃福慶：《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8年)。
- 陳耀南：《鴻爪雪泥袋鼠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
- 陳青松：《基隆古典文學史》(基隆：基隆市文化局，2010年)。
- 陳三井：《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年)。
- 新聲詩社：《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新加坡：新聲詩社，1981年)。
- 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續編：詩社集、詞社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DOI: 10.978.988237/2276)
- 黎國昌：《天香書屋倡酬初集》(香港：天香書屋，1955年)。
- 黎國昌：《天香書屋唱酬貳集》(東京：出版不詳，1980年)。
- 黎國昌：《南洋實業科學教育考察記》(廣州：廣東省教育廳，1933年)。

鄭子瑜：《詩論與詩紀》（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臺北：允晨文化，2016年）。

(二) 期刊論文

尹奇崚：〈1940年代南京汪偽統治時期古體詩詞的回溯〉，《東方論壇》第4期（2010年8月），頁87-93。

林立：〈流寓與本土意識：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東方文化》第48卷第1期（2015年6月），頁71-106。

徐丁丁：〈國立高校生物學系的初建——以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為中心的考察〉，《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2期（2017年12月）頁141-149。

陳振夏：〈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1959年7月），頁30。

曾志遠：〈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1959年7月），頁30。

葉秋濤：〈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第3期（1959年7月），頁30。

葛濤：〈新發現的兩個署名周樹人的通告考證〉，《現代中文學刊》第4期（2019年8月），頁53-56。

黎浩川：〈臺灣詩壇二周年紀念題句〉，《臺灣詩壇》第4卷第6期（1953年6月），頁12。

黎國昌：〈戊戌詩人節雅集〉，《亞洲詩壇》第1卷3期（1959年7月），頁30。

黎國昌：〈遷居南洋大學教授住宅三絕漫興〉，《亞洲詩壇》（港版）第1集（1963年9月），頁19。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第51卷第4期（1987年10月），頁132-148。

(三) 報紙文章

不著撰人：〈太平洋科學會議中國代表黎國昌君過叻〉，《南洋商報》第6版，1929年6月18日。

不著撰人：〈端陽節詩人雅集大會籌組“新社”改稱“新聲詩社”並推舉籌備委員多人〉，《南洋商報》第 6 版，1958 年 6 月 23 日。

黎國昌：〈庚子詩人節雅集感作〉，《南洋商報》第 15 版，1960 年 6 月 3 日。

(四) 電子資源

不著撰人：〈南大生反改制大罷課〉，多倫多南洋大學業餘網 (<http://www.nandazhan.com/>)，2000 年 12 月 23 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4 日。）

不著撰人：〈1966 南大學潮〉，多倫多南洋大學業餘網 (<http://www.nandazhan.com/>)，2000 年 12 月 25 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4 日。）

From South China to the South Sea: Guochang Li's Friendship of Diasporic Poets and His Poetry-use Practices^{*}

Li, Chih-Hau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Guochang Li, the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Xin Sheng Poetry Society of Singapore, studied in Université de Lyon, France. After earning a Ph.D. degree in science, he returned to China and taught at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Jinan University (Shanghai), and Central University (Nanjing). He moved to Hong Kong and taught at the Wah Kiu College in 1949 because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was later appointed as th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in 1955. He spent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with relatives in Japan. He was acquainted with poets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Taiwan, Hong Kong, and Japan. Li's works are an ample reflection of his experience as a diasporic person and of the poet friendship. His antiphonal exchange of Chinese poems with other poets who share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displaced by war embodied their collective

* This thesis is part of the results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The "Freedom"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 the Cold War Era: The Anti-Communist Community and Works of the Asian Poetry Forum"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108-2410-H-194-077-MY2).

frame of mind, as well as the poetry-use tendency of post-war Chinese poems. Through these works, poets dispersed to the four winds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each other, a sociocultural behaviour reminiscent of that of the literati in ancient China

Keywords: Diaspora, Xin Sheng Poetry Society,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an Literature, Chinese Poem